

简论秦汉军制的特点及其影响

黄今言

提 要 秦汉时期的军制有许多开创性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确立了以中央直辖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实行以征、募为重点的兵役制度;开创了以军屯、马政为显要内容的后勤建设。这些特点,不仅在当时的军队建设中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我国古代军制史上也带有它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对尔后几千年的封建军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中央直辖军 兵役制度 征兵制 募兵制 军屯 马政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奠定了封建制的初步基础,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军制上也有许多开创性特点,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里仅就其中的若干主要之点,做些概括性的论列。

一、确立以中央直辖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是国家执行对内对外政策的暴力工具。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密切相联。

中国古代的武装力量,各个时期自有不同。早在西周,除天子的军队外,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都有自己的军队。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军队则有公室兵、世族兵和邑甲等,而随着王室衰微,凡较大的战事,几乎都由诸侯国的军队来承担。在全国统一局面下的秦汉时期,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武装力量在以前的基础上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时的军事武装,主要由中央直辖军、地方军、边防军(含属国兵)所组成。而中央直辖军乃为武装力量的主体,地方军、边防军只是中央军的加强和补充。

“居重驭轻”是秦汉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据载:秦朝“尽征材士五万人”屯驻咸阳。^①汉代京师设有“南北军之屯”。^②为了更有效地驾御和控制政局,秦汉政权总是把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军摆在全国军事建设的首位。

秦汉时期的中央直辖军,主要有郎卫、卫士和戍守京师的屯兵这三大系统。郎卫由郎中令(光禄勋)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时称“南军”;戍守京师的屯兵由中尉(执金吾)统领。叫做“北军”。这些中央军的任务和建置等,各有不同。但都是沿着拱卫、强化汉王朝统治的轨迹向前发展。

秦至西汉初期,郎中令领辖的郎卫,实力较弱。郎卫集团基本上是以文职面目出现的侍从。郎卫尽管也有“执戟宿卫”、“出充车骑”的任务,但它实质上是仪仗队,战斗力并不很强。此时,中央军的基本力量是南、北军。由卫尉统领的南军,是掌管宫廷门禁的卫兵,皇宫卫队的主力,调自内郡,由经过了训练的正卒充任,番期一年。卫士值勤,持兵执戟,严守岗位,依制行事,对皇宫的守卫相当严格。《汉官仪》说:“殿外门署属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南军的卫士和光禄勋属下的郎卫,在职掌上是有区别的。不过,二者分工合作,互为表里,都是皇帝的近卫军。而由中尉统领的北军,驻屯在未央宫北,掌“徼循京师”和三辅地区的警卫。兵源通常调自三辅。军队集中屯驻,有固定的营垒,战斗力相对为强。《汉书·高帝纪》:“十一年七月,发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

霸上。”一次就发中尉卒三万,可知北军兵力之多。由此表明,在西汉前期,驻屯京师的南、北军,事实上已逐渐成为中央军的重要骨干力量。

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与发展,为适应对内对外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直辖军的实力。首先,将“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扩充郎卫的人数,增设了高级侍卫队期门、羽林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宫,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③

自期门、羽林建置后,不仅扩大了宫廷武装,充实了郎卫系统,使之与南军、北军形成鼎立之势。^④而且中央禁卫军的素质也有提高,增强了皇帝贴身侍卫的可靠性。众知,期门、羽林的人选条件,有别于南、北军,它是以“善骑射”、“有材力”为选募标准的。与更番卫士不同。他们一般选自“六郡良家子”、“从军死事之子孙”及“征战有功”者,往往父死子继,“以兵为职”,长期在役,带有世兵性质;汉政府重视对期门、羽林的军事训练,常有“习射”和“教以五兵”,除保卫皇宫外,有时还有“奉命出征”的任务;同时,期门、羽林的身份较高,属于郎官,有特殊的冠戴服饰,待遇优厚,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兵。故他们在思想上、军事上都比较过硬。绝对忠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汉王朝。当然,六郡良家子投募期门、羽林的目的也无非是羡慕天子亲军的优厚物质待遇和令人鼓舞的政治前途。因为他们之中不少人由此而选拔为官,或出使郡县,充任守令;或领兵打仗,担任武将。赵充国、甘延寿等人,就是以“善骑射补为羽林”,后来身居要职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从某种意义上说,期门、羽林又为汉廷培养、输送人才,起了选拔将吏后备队的作用。

在扩充郎卫、组建高级侍卫队的同时,汉武帝为强化中央军,又在元鼎四年,于中尉属下增设了左、右、京三辅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分掌三辅;太初元年,将“中尉”改为“执金吾”;征和二年,增设京师城门屯兵,设城门校尉,负责警备长安的十二城门,归北军统辖。尤其值得重视者就是在北军中增设“八校尉”。即“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⑤

这“八校尉”,也就是八个兵团。它包括骑兵、步兵、车兵等多个兵种,其中以骑兵兵团为主。每校尉所领的兵力,各约七百人左右,彼此具有协同作战的能力。《补汉兵志》说:“武帝增置七校(因胡骑不常置,故此称七校)……盖选募精勇及胡骑内附之人,比之期门、羽林,无复更代,而京师始有长从坐食之兵矣。”说明八校尉所领屯兵,也是“以兵为职”的常备军。它既有宿卫京师的责任,也有奉命出征的任务。兵源除部分异族外,主要调自三辅地区。这是武帝直接控制的一支精锐部队。

经过汉武帝对侍卫队和南、北军的调整、扩充之后,西汉王朝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便基本上得到了确立。

迄至东汉一代,中央军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尤为明显。刘秀建国后,面对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为强干弱枝、集中军权,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改革的重点是精简和裁减地方军。例如: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⑥取消地方上的专职武官。同年又“罢都试”之役。^⑦建武七年,郡国“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民复还民伍。”^⑧建武二十二年,“罢边郡亭侯吏卒”等。^⑨

东汉政权对中央直辖军,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如对将吏在权力分配上的更动和兵员数量的某些压缩等,但它若和当时的地方军、边防兵相比,中央军的实力仍然相对为强。当时的中央军,在形式上继续沿袭了西汉的郎卫、南军和北军三大系统,而在内容上则有新的发展。

首先,光禄勋所辖的郎卫系统,编制上比西汉更为完备。据《续汉书·百官志》: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属官有:五官中郎将,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左中郎将,比二千石,主左署郎;右中郎将,比二千石,主右署郎;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主虎贲宿卫。下有左右仆射、左右陛长(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从节虎贲(比二百石),皆掌宿卫侍从;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主羽林郎。下有羽林郎(比三百石)、羽林左、右监(六百石),主羽林左、右骑等。从

这些吏员的设置来看,体制、机构比以前庞大了,说明东汉确乎拥有一支相当可观的皇卫队伍。

卫尉的职权范围,东、西汉大致相似。唯东汉在员额的设置上略有更动。《续汉书·百官志》云: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宫门卫士,宫中微循事,有丞一人,比千石。属官有:公车司马(六百石),丞、尉各一人,掌知非法,主阙门兵禁,戒非常;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宫卫士,丞一人,计有员吏九十五人,卫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北宫卫士,丞一人,计有员吏七十二人,卫士四百七十一人;左右都侯各一人(六百石),主剑戟士,微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其中右都侯员吏二十二人,卫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侯员吏二十八人,卫士三百八十三人。在卫尉的属官中,还有宫掖门司马,计有七门、七司马,秩比千石,也各有一定的员吏和卫士。由此可见,卫尉系统的实力仍然相当雄厚。

至于北军系统,东汉执金吾的权势虽有削弱,属官也有所减少,然驻屯京师的兵力并未削弱,只是把守卫京师的重任,分别转移到“城门校尉”和“北军中侯”就是了。《续汉书·百官志》载:“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洛阳城门十二所。下有司马一人,秩千石,主兵。十二城门每门设侯一人,秩六百石。城门校尉所领的兵力,史文未载,然对“北军中侯”的兵力乃讲得较为具体。其中明确讲到:北军中侯一人,六百石,“掌监五营”。这五营也就是“五校尉”。即屯骑校尉,有员吏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越骑校尉,有员吏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步兵校尉,有员吏七十二人,领士七百人;长水校尉,有员吏一百五十七人,领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射声校尉,有员吏一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这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秩均比二千石。他们所领之兵,似为刘秀原从士兵所改编,其后形成父死子继的。他们既有“宿卫京师”之责,又肩负着“应命从征”之重任。北军中侯所领的这支军队,是北军的主力,其战斗力相当强。远非当时的郡兵和边兵所能比拟。

此外,自东汉“罢材官、骑士”后所设置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以及各关隘要地的屯兵等,这时也通常归中央军直接指挥,成为中央军的重要构成。所以东汉一代,凡遇大的战争,更加有赖于中央军的出击。中央军的主体地位,在西汉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突出。

秦汉时期的中央直辖军,不仅在建置上较为完备和严密,而且它和地方军、边防军相比,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兵力集中,形成三层保卫圈,各自任务明确,而又分工协作,相互制约;二是士兵身份较高,待遇优厚,由皇帝的信臣和要员统兵,是天子的亲军;三是武器装备精良,管理严密,训练有素,是精兵劲旅,战斗力较强。正因如此,所以汉初诸吕之乱,周勃以“北军安刘氏”;平定七国之乱,汉廷以北军的参战而获胜;武帝晚年的戾太子(刘据)事件,也因北军“不肯应太子”,而太子失败。所有这些,都有力说明中央军对稳定当时政局起有重大作用。

宋人山斋易氏说:“汉之兵制莫详于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⑨两汉在军制建设上实行“居重驭轻”,组建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巩固统治的核心作用,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自秦汉以后,历代中央军的组织形式和内容虽有不同,但统治者都着眼于中央军的建设这一点却没有改变。曹魏以后的中军及唐代的中央禁军等皆为例证。实行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和当时在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是相一致的。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重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也可收到稳定社会、安顿边境之效。

二、实行以征、募为重点的兵役制度

兵役制度是国家“编户齐民”参加武装组织,接受军事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制度。它往往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几经演变。商周时期,国家采取军政合一的编组形式,兵役主要是民军制。时至战国,各诸侯国为适应兼并战争需要,纷纷扩大兵源,于是由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兵役制,逐渐向征发农民参军的征兵制演变,期间虽然偶有“选募”,但主要是实行郡县征兵制。

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比较复杂。在四百多年的时间内,曾经实行过征兵制、谪戍制、志愿兵制(“私装从军”)、募兵制和刑徒兵制。但经细考,其中的征兵制和募兵制是主要的集兵方式。就其发展趋势来说,大致上是秦至西汉前期以征兵为主,自武帝之后征、募兼施,迄至东汉时期,则征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

征兵制具有义务兵制的性质。秦至西汉前期,承袭了战国旧制,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当时起役的年龄标

准,依照法律规定是:秦代十七岁始傅。汉景帝二年,改行二十始傅。汉昭帝开始则二十三岁始傅。而老免年龄,有无爵与有爵之分。有爵士伍,五十六岁免役;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老免。^⑩服役期限,通常是“为正一岁,屯戍一岁。”^⑪即适龄编户在一生之中,服两年兵役。

征兵的具体办法,一般由中央将征兵的任务数下达到郡,一个郡征兵多少,自有员额,^⑫大概边郡多于内地,精兵所在又多于其他地区。如“六郡良家”、“汝颍步兵”、“江南弩手”亦多少不等。同时因地区不同,征点的兵种也为有别。^⑬当时全民有义务当兵,但非尽民皆兵。官僚地主、殷富之家享有许多优复特权;适龄对象应征为兵,也有身体、材力和丁口的标准,以之“为役先后”。所谓“凡民皆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⑭在征兵制下的士兵来源,一般来自国家“编户”,农民是征点的主要对象。士兵的社会地位和素质,在西汉以前比较高。唐之府兵也是一种征兵制,汉、唐前期的强盛之局与实行征兵制度不无关系。

秦至西汉前期,征兵制度之所以能大量推行,这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于当时有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存在“授田制”与“名田制”,土地问题还不甚紧张,自耕农较多;又实行了军功爵制,民间“尚武”风气较盛,士兵的社会地位较高,人们乐于从军等。由于存在这些征兵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故通常没有必要采用谪戍和刑徒兵制,它只是在战争期间扩充兵源的应急之举。

但自西汉中期直至东汉,除实行征兵制外,募兵制日趋得到推广,同时也辅之以志愿兵制、“七科谪”及刑徒兵制。志愿兵为数不多,且带有偶发性。刑徒兵虽在东汉常见史册,然多用于边境。所以这时的集兵方式,主要是由征、募兼施到招募日甚。

汉之“募兵”,即广求士兵之意。也就是募集、招募或集聚“应募”从军者,给予一定的经济、政治待遇,使其承担当兵任务的制度。西汉武帝之后,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招募之举始渐增多。表现在:(1)招募的地区广、次数多。据文献资料的粗略统计,从武帝元封二年到献帝建安二十年,募兵不下五十八次;地区涉及全国多数郡县。(2)招募人数多,规模大。一次募兵,往往少者数百上千,多则几万、几十万。王莽始建国二年,为出击匈奴,“竟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之众。”^⑮(3)招募的形式和种类多样。除官府在地方“编户齐民”中招募之外,还有从“刑徒”中招募和从“家兵”或“军中”招募勇士者。^⑯其间有官募,也有私募。(4)国家运用募兵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在中央军中有部分募兵充任,在边境要地有募兵屯戍,征讨少数民族和镇压农民起义也大量使用募兵。^⑰东汉在征兵制渐衰的情况下,国家军队多有招募。尽管当时国家编户的军籍仍然保留,然征兵之制多在边郡实行,而内郡则为少见。因此,如果说西汉中期以前是以征为主,招募尚未形成恒制或带偶发性的话,那么自武帝以后至东汉,便在征兵的同时,逐渐发展为大量的招募。

武帝后募兵得以推行的原因,除兵制自身发展的规律外,主要是当时土地私有制深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⑱汉代募士的来源较为广泛。除了有汉族“编户”和破产农民之外,还有少数民族及刑徒应募为兵。后来士兵地位逐渐下降与此有关。不论募兵的族属及身份如何,凡受募对象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文献记载中提到的所谓“猛士”、“壮士”、“先登”、“悬索相引”、“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等等,^⑲都是指受募者在身体、技能和勇敢等方面的条件。就是说,受募者除了具备体格健壮之外,还要掌握技巧、肯于效力,有勇敢精神。当然,国家对募者,也得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政治待遇。这在文献中称之为“赏赐”或“赐钱”。例如:明帝永平元年,“募士戍陇右,赐钱人三万。”^⑳又顺帝建康初年,广陵张婴等聚众起义,汉廷“广募赏赐,钱、邑各有差。”^㉑这些都是实例。在中国古代,募兵的性质和方式,各个历史阶段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或半强制的,有非强制的。既有公募,也有私募。汉代型的募兵,和它同期的征兵制固有不同,而与后世的募兵相比,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汉代的募兵是一种早期的职业兵,受募者的身份不如后世自由,不能看作与自由募兵制下的雇佣兵那样,它还带有相当的强制性。当时的募士与将帅往往结成主从关系,不能随便离开军队,存在着较强的依附性。所以,在东汉后期,地方军阀势力通常利用募兵发展私人势力。

兵役制度采用以征、募为主的秦汉时期,还应当指出一点,就是它的地域宗族色彩很浓。当时不仅各军、兵种的建置因地而异,征兵、募兵均纳入地域范围;而且军队的训练、编制、调发也多以地域为单位。至于东汉的部曲、家兵,更是乡里血缘关系的突出表现。这种地域宗族性和当时的村社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秦汉时期实行以征、募为重点的兵役制度,在时间序列上,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时以征兵为主,募兵为

辅。有时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更要看到：征兵制多与义务兵制相联，有明确的始傅年龄和役期；而职业兵制则主要源于募兵制，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东汉一代，征兵渐衰，募兵日甚，这意味着“兵民合一”向“兵民分离”的方向发展。

兵役制度通常要受到国家经济、政治及战争诸因素的制约。在不同历史时期，尽管兵役制度复杂多变，但在尔后的历朝中，一般皆沿着秦汉征、募兼施的模式发展。例如：三国初期以募兵为主，局部地区也行征兵。唐前期的府兵采用征兵，后因均田制破坏，从玄宗开始，又渐行募兵制。五代至宋朝，主要实行募兵制。而明代在吸收其教训的基础上，则再行以募兵和征兵相结合的集兵方式。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开创的以征、募为主的兵役制度多被后世所沿用，而且征、募过程中的地域宗族观念也一直影响到近代。

三、开创以军屯和马政为显要内容的后勤建设

“后勤”一词是近代的称谓。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储备”、“积贮”、“饷馈”、“武备”、“转输”等，实际上都是属于近代意义的后勤范围。它主要是指军队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物质保障。

军事后勤，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极为重要。孙武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⑨后勤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构成和战略因素，它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而牵系国计民生的军事后勤，又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紧密相关。

不同的社会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军队后勤补给的内容和手段。春秋以前，军队的后勤问题比较简单。当时的所谓“积贮”、“武备”，通常只指粮饷、兵器、车具方面的筹措。然在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以及对羌人的战争中，几乎每次所动员的兵力都在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以上，因此这时期在后勤思想和后勤措施方面，较先秦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军事后勤，十分重视军粮储备，军马征集。为此，在后勤措施上，开创性地将军事屯田和马政问题，提到了后勤建设的突出地位。

军粮储备的多寡，往往是衡量武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方面。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⑩这是讲粟多财馀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为保证军粮不乏，秦汉统治者除在战争中“因粮于敌”和掠夺之外，曾采取过不少的积极措施。例如：重视与努力发展战争后方的农业生产，以提供充足的粮饷支援前线；在军事要地兴建大规模的粮仓，以满足军队的口粮给养；修建以军事为目的的交通干线，解决军粮的转输等。尤其值得重视者，就是开展军事屯田，通过士卒且耕且战，就地筹划军粮的供应。

汉代的“军屯”，大约开始于武帝元狩四年至五年之间。随着西北边境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屯田区逐步扩大，当时从上郡、朔方、敦煌、酒泉到西域的轮台、渠犂、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军屯。不仅屯田区至为广泛，而且屯垦吏卒也有不少，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⑪屯田是戍卒的重要任务之一。屯田区设有屯田校尉、农都尉、护田校尉、守农令等，专门负责屯田事务。在赵充国的屯田奏中说：“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赋”即给与之意。^⑫即规定田卒每人平均当承担二十亩土地的耕种任务。由于屯田是一种由国家经营的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活动，屯田所需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种子、耕牛以及田卒的基本生活资料，包括口粮、衣服等，均由国家供给。所以，屯田卒不存在交纳“田租”的问题，而是将屯田生产的全部的收获物，一律上交国家仓库。如据汉简记载：“入二年，粟百五十六石口，田二顷七十亩，秬稷卅一石，十月戊寅仓佐口口龙勒万年里索良。”^⑬这条材料说的是，二百七十亩屯田地，收“粟百五十六石”，“秬稷卅一石”，总计为一百九十七石，皆为仓佐于某二年十月戊寅“入”仓。这与文献所说：“田一岁，有积谷”^⑭和“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的记录甚相吻合。皆表明当时的军屯收获物是全部上交国库的。

边郡戍卒且耕且守，任务艰巨。但大量开展屯田的结果，“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⑮它不仅开发了北部边境，巩固了边防；亦节省了从内地长途转输的大量消耗；还保证了部分军粮的就地补给。所以东汉至三国时期，将边郡军屯引入中原内地，又有所发展。关于两汉屯田问题，不少学者已有专论，这里不必赘言。

在军事后勤中，除开创“屯田积谷”外，秦汉时期还致力于骑兵机动作战的后勤保障，大力加强马政建设。

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①马在古代是“甲兵之本”,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在古代战争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汉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和反击匈奴的战争需要,对马的积蓄十分重视。秦朝建立后,马政由九卿之一的“太仆”总领,在内地和边郡分别设有“厩啬夫”、“皂啬夫”与“六牧师令”等,国家对管理马匹的吏员有定期的考核制度,赏罚严明。因而使官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汉初,经过秦末的战乱,社会经济残破,马的数量一度大为减少。据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②马的价格一匹值“百金”。由于战马缺乏,不能组编骑兵,刘邦在白登山大受匈奴折辱。为扭转这种局势,后来汉政权曾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马政建设。除在秦的基础上充实健全养马机构、鼓励民间养马之外,当时还明令规定:“母马不得出关”,防止好马外流。又“益造苑马以广用”,^③扩建官营养马场的规模;加强对官马的经营管理制度,从选马、喂马、用马以至于对病马的治疗等,均有严格要求,以保证战马的补给需要。

汉武帝即位后,在公、私马匹有了一定规模的基础上,为组建骑兵集团,又进一步推行适应战时需要的马政措施。例如:“贵平杜马价”,^④提高马的价格;向郡国调马,以补前线马匹的不继;^⑤“县官无钱,从民贳马”;^⑥“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⑦“官假母马”,定期还息;“籍吏民马,补车骑马”;^⑧还有,就是寻求良种,改善军马品质等等。汉武帝时,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在解决国家马源的问题上,西汉以牧养、征集为主。而东汉则逐渐转向采用购买、贡纳、征调等方式,马匹的数量在东汉虽有压缩,然马政建设似乎一直未见放松。两汉的骑兵之所以能发展成为重要的兵种,关键在于有足够的马源保障。

秦汉时期大力加强马政建设,不仅有利于发展交通、繁荣社会经济,而且对富国强兵,反击异族侵扰起有重大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秦汉军事后勤所涉及的面已经很广。除上述之外,还包括武器装备,传令系统,军事交通,军费筹措,医药卫生,丧葬抚恤等等各项专业勤务及战争后方建设。毋庸置疑,为做好这各方面的后勤保障,统治者都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有可供借鉴之处。不过,其中有许多举措是承袭前制,或是属于前制的发展。而“军屯”和“马政”则不然。当时对军屯和马政问题,不仅在认识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措施上有许多开拓性的创新,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自汉代以后,历朝所实行的“屯田”自不用说,就是“马政”,对后世同样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仍曾一度因官马发展不力而借鉴了汉代的经验。^⑨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刑法志》 ③应劭《风俗通义》记(刘向对汉成帝)曰:“文帝时政颇遗失……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谓期门设置于文帝之时。此与《百官公卿表》记载相悖。窃疑《风俗通义》有误。 ④关于郎卫,包括期门、羽林的统属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它属南军。例如:王应麟《玉海·兵制》条,徐天麟《西汉会要》,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均主此说。现经我们细察,郎中令(光禄勋)所属,当自成系统,不属南军。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又据《汉书·刑法志》:“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尉。”此与《百官公卿表》记载有异,是因“胡骑不常置,故言七校也。” ⑥⑦《续汉书·百官志》。

⑧⑨《后汉书·光武帝纪》。 ⑩《文献通考·兵考》。 ⑪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书·景帝本纪》、《盐铁论·未通篇》、《汉旧仪》。 ⑫《汉书·食货志》。 ⑬据文献记载:汉代的兵力,有所谓“大郡一万”、“小郡数千”的说法。 ⑭钱文子:《补汉兵志》。 ⑮拙稿:《汉代征兵制度中若干问题考辨》,见《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⑯《汉书·王莽传》。 ⑰分见《汉书·武帝纪》、《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岑彭传》、《后汉书·朱儁传》等。 ⑱分见《汉书·宣帝纪》、《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度尚传》等。 ⑲拙稿:《汉代型募兵试说》,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⑳分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耿弇传》、《后汉书·段熲传》、《后汉书·虞翻传》、《后汉书·刘陶传》。 ㉑《后汉书·明帝纪》。 ㉒《后汉书·滕抚传》。 ㉓《孙子·军争篇》。

㉔①②③《汉书·食货志》。 ㉕《汉书·武帝纪》、《汉书·食货志》。 ㉖④《汉书·赵充国传》及颜师古注。 ㉗《疏简》615。

㉘《汉书·西域传》。 ㉙《后汉书·马援传》。 ㉚《史记·平准书》。 ㉛《汉书·武帝纪》。 ㉜《汉书·汲黯传》。 ㉝《汉书·武帝纪》 ㉞《明会要》下卷六十二。

(责任编辑:肖华忠)